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教育部重大课题成果系列丛书

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编



文物出版社

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15

责任印制 梁秋卉

责任编辑 杨冠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 /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010-4118-3

I. ①聚… II. ①北… III. ①聚落环境—考古学—研究—中国 IV. ①K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5742 号

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40.25 插页:2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4118-3 定价:280.00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非经授权,不得复制翻印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批准号：2000ZDXM780001

前言

严文明

2000年7月，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成立。按照规定，中心的学术委员必须有三分之二的校外学者参加，研究人员也必须由校内外学者共同组成。研究课题应能反映学科发展的前沿状况和当前备受关注的话题。我们经过研究，确定把“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作为中心开展研究的第一个课题。之所以选择这个课题，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越来越成为考古界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不少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或视角进行了研究，但多是从某个重要发现或某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探索，认识颇不一致，从全局进行的综合性研究不多也不够深入。作为一个号称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的机构，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课题。二是现在的研究多是由个人分散进行，在资料 and 认识上不免受到一些局限。研究中心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特别提倡吸收其他单位的相关学者共同进行研究。而本课题恰好是最适合用这种方式来进行研究的。

本课题由我和赵辉主持，先后邀请了郭大顺、田广金、栾丰实、杨建华、张弛、孙华、韩建业、魏峻和秦岭等学者参加。他们之中有的是在考古学领域颇有建树的知名学者和领导者，有的是十分优秀的年轻学者，对聚落考古和文明起源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2000年7月16日，课题组在研究中心召开第一次会议，初步讨论和研究了本课题的设想、基本思路和大致结构，并且做了初步的分工。2001年10月15~23日，课题组成员赴山东考察了城子崖、西朱封、桐林、陵阳河、大朱村、丹土村、两城镇、东海峪等一系列史前聚落和早期城址，顺便对课题的进行情况交换了意见。接着又于2001年12月11~13日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会的除本课题成员外，还有来自日本、韩国、美国、以色列和国内对本课题有兴趣并有所研究的学者。这次研讨对本课题的推进提供了不少启示和帮助。2002年11月25~27日，课题组在北京陶然宾馆召开讨论会，各人汇报了初稿完成的情况和主要内容，并且进行了认真而比较深入的讨论。我把课题的基本要求再次做了

说明,并且把下一步的工作做了部署。2003年虽然基本结项,但还有一些内容需要进行加工和修改。大家平时工作都比较繁忙,只能断断续续挤时间来做,这样一拖就是几年。现在终于可以付梓了。在课题进行的过程中,因为田广金生病,他负责的项目只好全部由韩建业承担。更不幸的是他竟然抗不过病魔的折磨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让同仁们感到十分悲痛。

从考古遗址分析出各种形态的聚落,又从各种形态的聚落分析出各种形态的社会单元和社会结构,再从聚落形态的演变探索社会形态的演变,就是聚落考古的研究方法,也是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分支之一的社会考古学的首要任务。1928~1935年安阳殷墟的发掘便开启了聚落考古的先河,但那时还没有自觉进行聚落考古的理念。1954~1957年西安半坡的发掘明确提出从聚落形态分析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形态,但田野考古方法不过关,分析不得要领。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先是苏秉琦先生提出划分文化区系类型的理论并得到广泛的响应,接着又在各地大力推行聚落考古的研究方法,使中国史前考古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史前文化是多元的,各个地方的文化都有自己的起源和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同时各个地方之间又是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从而逐步成为一种多元一体的格局,为往后中华文明的发展和特色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这种研究基本上还是属于文化历史范畴的,如果要进行社会历史范畴的研究,还得有新的理论和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聚落考古。这一点现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了。不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前提或基础,那就是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梳理。如果连文化历史发展的脉络都没有弄清楚,又如何研究社会历史的演变呢?很明显,只有在文化历史的研究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才有条件进行社会历史层面的研究。这正好说明为什么聚落考古理念的产生虽然很早,却要等到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情况下才得以较快地推行起来。

按照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梳理出来的时空框架和文化谱系来考察聚落形态的演变情况,很容易看出聚落由小到大,由差别不大到等次分明,由最初中心聚落的出现到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它反映一般社会发展的前进性和阶段性。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聚落演变和文化的发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有时文化上是延续的,聚落形态却发生了变化;有时文化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而聚落形态并没有随之发生变化。如果从较大的范围来进行分析,就会看出各地聚落的特点和演变轨迹都有明显的差别。这里有自然环境和经济类型等方面的原因,有历史文化传统的作用,有来自不同文化的影响,还有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反映等等,

情形是很复杂的。这只有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并且在广泛比较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某种带规律性的结论。

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学术界通过对墓地和墓葬埋葬制度的研究来探讨社会性质和社会组织结构做了许多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也走了一些弯路。从 80 年代开始才把注意力集中到对整个聚落的研究，包括家屋形态和功能的研究、单个聚落形态结构的研究，墓地与聚落关系的研究、聚落分布与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聚落形态演变的研究等。由于这类研究的开展，便把从 80 年代开始的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热潮迅速地纳入一条全新的正确轨道。由于各地考古工作很不平衡，这类研究的内容和认识的深度自然会有较大的差别。无论如何，这样的研究方法比起那种从概念出发，先问什么是文明，再找一些文明的标志来对号入座的方法会更加切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我们的研究方法是首先对全国的几个主要文化区分别进行文化区系和聚落形态演变的研究，然后对各区文化进行比较和必要的概括，以期得到一些基本的认识。还特地与西亚地区做了初步的比较。因为那里的聚落考古和文明起源的研究是做得比较好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了保持各人研究的特点，在某些概念和表述方式上不强求一律。这样每一篇都可以看作独立的论文，全书又基本是一个整体。我们深知自己的工作还很有限，认识也难免有些肤浅。因此本书的出版自然不是为了提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主要还是想探索一条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正确的道路。希望以此得到学术界同仁们的指教。

目 录

前 言	严文明(1)
中原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	魏 峻(1)
海岱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	栾丰实(107)
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	张 弛(204)
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	秦 岭(266)
成都平原先秦时期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	孙 华(339)
北方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	韩建业(368)
东北南部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	郭大顺(457)
论中国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	赵 辉(541)
西亚史前聚落的发展与文明进程	杨建华(560)
后 记	赵 辉(631)

中原地区的史前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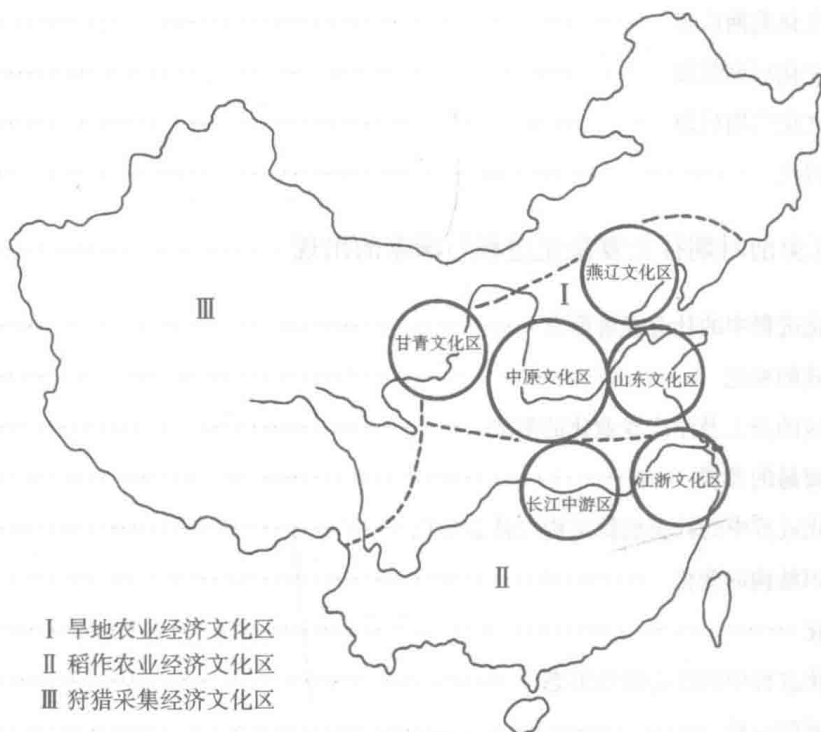
魏 峻

(广东省博物馆)

一 中原地区史前文化谱系和文化格局演变	2
二 中原地区史前聚落的演变	6
(一) 新石器时代中期	7
(二) 仰韶文化前期前段	18
(三) 仰韶文化前期后段	31
(四) 仰韶文化后期前段	38
(五) 仰韶文化后期后段	47
(六) 龙山时代	52
三 中原地区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与国家的出现	70
(一) 复杂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形态	70
1. 生计方式的变化	70
2. 经济领域的分工及生产专业化的形成	72
3. 交换和贸易的发展	77
(二) 复杂化进程中的社会组织结构与社会分化	80
1. 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	80
2. 社会分化	86
(三) 复杂化进程中的社会政治形态	90
1. 邻里关系的变化	90
2. 祭祀·战争·治水与中原地区国家的形成	93

一 中原地区史前文化谱系和文化格局演变

广义上的中原是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包括了河南省大部、河北省和山西省南部、陕西省东部在内的广大地区。丰富的历史文献表明，不仅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最早的国家——夏、商、周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区域建立起来的，而且三代之后的许多王朝也将这一区域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中原地区是我国考古工作开展最早的区域，从上世纪20年代至今经过调查和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甚多，而且以仰韶文化谱系及分期为重心的考古学研究可谓中国史前考古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条主线。随着全国范围内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框架的日渐明朗，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清晰。继苏秉琦先生以区系类型观念梳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将中原地区列为六大核心区系后^①，严文明先生更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不同层次结构，认为中国史前文化具有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即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江浙这样五个第二层次的文化区围绕核心的中原文化区（图一），并被分布在更外围的第三层次的文化区所环绕的多元一体格局^②。这种文化格局的形成一方面与不同文化区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状态有关，一方面也同这些文化区所处的地理位置



图一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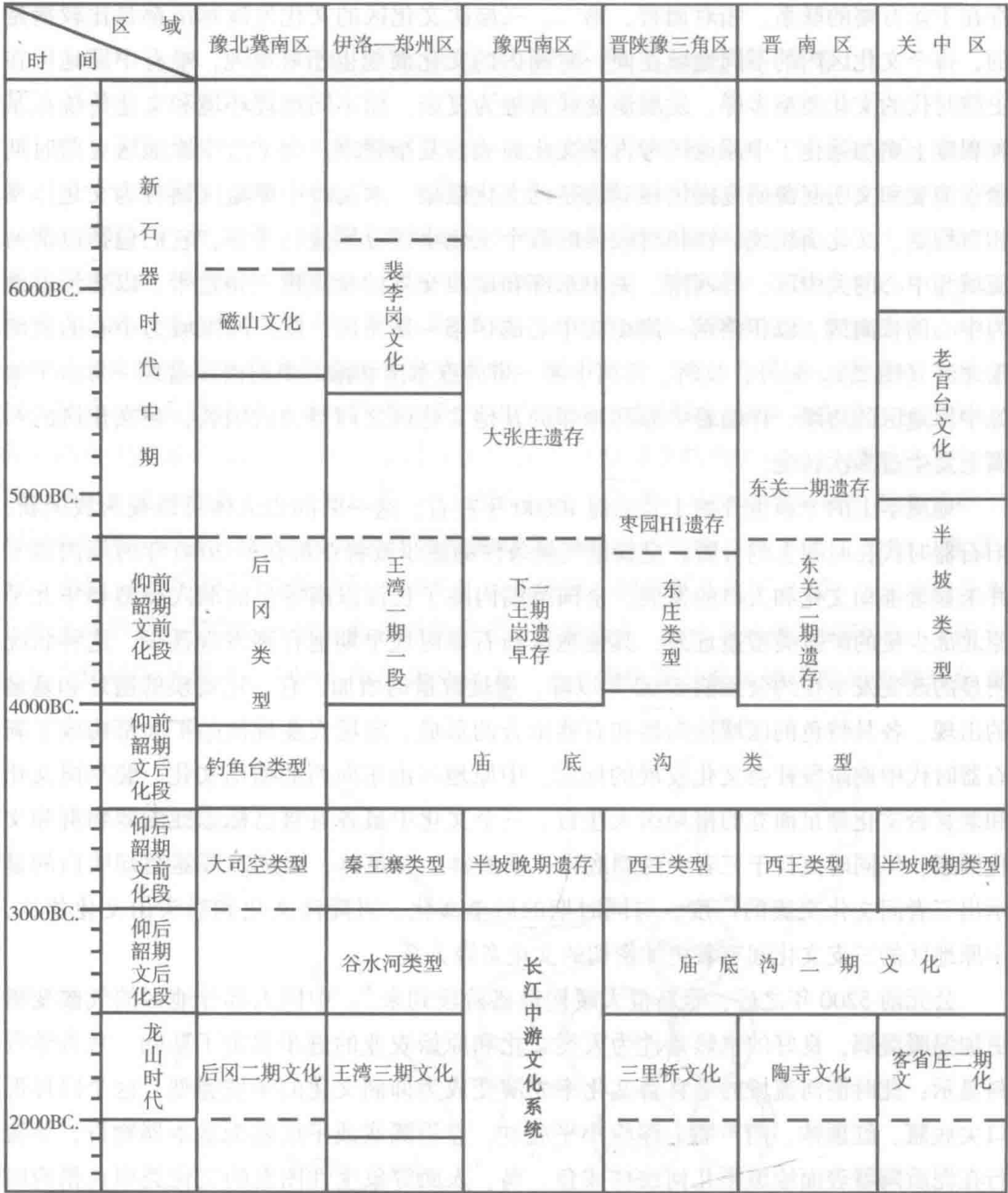
（引自《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对而言，第二、三层次文化区的文化发展脉络都是比较清楚的，每个文化区内的不同地域在同一时期内的文化面貌也相对单纯，唯有中原地区在史前时代的文化类型多样、发展演变线索极为复杂，而不同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强化了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复杂程度。为了给中原地区史前时期聚落演变和文明起源研究提供相对清楚的文化框架，本文将中原地区划分为文化体系相对稳定、文化面貌统一性相对较强的数个文化小区分别进行考察，它们包括以渭河流域为中心的关中区，晋西南、关中东部和豫西交界的晋陕豫三角地带、以襄汾盆地为中心的晋南区、以伊洛河—嵩山为中心的伊洛—郑州区，以洹河流域为中心的冀南豫北区（图二）。另外，汝河、沙河中游一带的豫东南和豫西南的南阳盆地一带由于地处中原地区的边缘，伴随着中原和相邻的其他文化区之间势力的消长，在文化区的归属上发生过多次转变。

地质学上的全新世开始于公元前 10000 年左右，这一时间也大体可以视为我国新旧石器时代在时间上的分野。全新世气候条件的逐步改善在最初的 3000 年时间内似乎并未显著推动文化和人口的发展，全国范围内除了长江以南零星的洞穴类型和华北平原北部少量的旷野类型遗址外，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则发现甚少。这种状况明显的改变发生在约公元前 6500 年以降，遗址数量的增加、有一定规模的遗址和墓地的出现、各具特色的区域性陶器和石器组合的形成、定居农业规模的扩大都构成了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社会文化发展的标志。中原地区由东向西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鼎足而立的格局引人注目。三个文化中虽各有自己标志性的器物群和文化因素，但同时流行于三者中的圜底钵、平底钵、三足钵、圈足碗等器类却明白的显示出三者间文化交流的广度。与同时期的后李文化、兴隆洼文化和彭头山文化相比，中原地区的三支文化间有着更加密切的文化亲缘关系。

公元前 5200 年之后，全新世大暖期最盛阶段到来^③。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变得更加温暖湿润，良好的水热条件为人类文化和原始农业的进步奠定了基础。考古学资料显示，此时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率先演变成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这个以杯形口尖底瓶、红顶钵、葫芦瓶、深腹小平底瓮、卷沿圜底或平底盆为基本器物群，并流行在泥质陶器表面绘黑彩几何纹样或鱼、鸟、人面等象生性图案的文化类型在稍晚时候向北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陕北及鄂尔多斯地区，向东沿黄河一线进据洛阳以西一带，而进入南阳盆地的半坡因素则可能是以汉水谷地作为通道的。约略同时，分布在中原地区东翼的后冈类型也以同样强劲的势头向外扩张，使包括豫北冀南、鲁东北、晋中、冀西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的文化面貌空前地统一起来。两个文化类型的因素分别在河套和郑洛之间形成僵持，正是受这样两个文化类型东西对峙态势的压迫，郑洛和晋南地区虽然分别存在王湾一期一段遗存和东庄类型之类的地方性文化个体，

4 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



图二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示意图

但它们的发展空间显然是相当有限的。

公元前 4000 年之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东西对峙的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其动力来自晋陕豫三角地带的一支土著文化势力的增长。由东庄类型脱胎而来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以其特有的曲腹盆、双唇口尖底瓶、夹砂罐、圜底釜、灶等组成的陶

器群和发达的弧线几何纹彩陶迅速的改变着周邻地区原有的文化面貌。庙底沟类型的居民向东分布到华北平原的北部、向西抵达甘青的湟水谷地、向南进据汉水中游和鄂北一带、而北向则推进到河套附近^④。此时不仅中原各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较前一阶段越发地统一起来,而且中原文化区在同周边其他文化区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占据了更加主动的地位。这一方面表现在我国境内不同地区庙底沟文化因素统一性之强和分布范围之广,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周边其他文化区的陶器风格及发达的玉石器制造技术并没有对分布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产生多大的影响。

公元前 3500 年左右,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进入其发展的晚期阶段。中心区的文化凝集力和辐射力都逐渐减弱,中原地区统一的文化格局被分裂的区域文化所替代,中原内部各区域的地方文化特点突出起来,在豫北冀南、伊洛—郑州、晋陕豫三角地带和关中地区分别形成了大司空类型、秦王寨类型、西王类型和半坡晚期类型。这些文化类型除了共同继承了仰韶文化前期的若干文化传统之外,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影响似乎较为微弱。此时,中原文化区同周边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关系被逆转过来,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和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分别将鄂北—南阳盆地和豫东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这两个文化的居民可能已经进入到郑州及其附近地区。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发现的大型宗教活动遗迹、贵族墓地和发达的攻玉技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屈家岭文化超大型聚落的兴起和墓葬资料显示的高度社会分层,无疑都代表了这一时期周边文化的强烈反弹^⑤。

进入仰韶文化晚期后段时,存在于中原不同文化小区的考古学文化间的互动关系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动。以鼎、鬲、釜、灶为基本组合的遗存全面兴盛于中原的大部分地区,中原地区在继庙底沟类型之后再次形成文化面貌上较为统一的文化区。考古学界将这些含鬲而无喇叭口尖底瓶的遗存称为庙底沟二期文化^⑥。现有的种种迹象表明,庙底沟二期文化虽然可能接受了来自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因素的某些影响,但该文化中一些富有特色的器物应该是首先形成于西安以东的渭河下游、豫西山地以及中条山以北的涑水河流域一带。然后向西、向北和向东三个方向影响到渭河中游、山西省中南部地区。从而在整个中原地区的西半部形成了庙底沟二期、案板三期、陶寺早期和白燕二期遗存为代表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系统中的四个不同类型。虽然因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在面貌上同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时代遗存之间都有着一定的承继关系,目前学界对其性质还存在不同认识^⑦,但从现有资料不难看出,在公元前 2900~前 2500 年左右晋陕豫三角地带再次成为中原地区文化强势的中心和文化发展的动力。需要指出的是,当庙底沟二期文化在中原地区的西部完成对仰韶晚期早段遗存全面替代的同时,与晋陕豫三角地带毗邻的伊洛—郑州地区秦王寨类型的文化因素却持续而稳定地保持下来^⑧,这些因素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相结合并最终构成了以大河村五期和谷水河遗存为

代表,不能完全纳入庙底沟二期文化系统的地方类型—谷水河类型。如果将这种文化格局同郑洛地区在仰韶文化晚期前段时出现了古城等现象联系起来考虑,个中多少暗示了伊洛—郑州地区文化发展的后劲和“天下之中”地位的初步形成。由于考古资料的不足,此时豫北冀南的文化面貌尚无法说得十分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司空类型”的因素在塑造当地文化面貌方面起到了相当关键性的作用。

公元前 2500 年之后,中国史前文化的面貌伴随着铜石并用时代后期阶段的到来而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分布于整个中国东部各文化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有渐趋一致的倾向,主要文化风格接近,由此一些学者提出了“龙山期”^⑨或者“龙山时代”^⑩这样的概念对这种文化共性加以概括。龙山时代的考古学诸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相互冲击和互相渗透表现的空前剧烈,是中国史前社会急剧动荡和改组的阶段。此时中国东部几个文化区系之间文化关系的变动对于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时的整个中原地区出现了一个可以从考古学角度同中国东部其他地区分别开的文化实体—中原龙山文化,中国历史上“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趋势逐渐成形^⑪。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原龙山文化体系的认识还略有分歧,但多数研究者都同意中原龙山文化的“大家庭”包括了渭河流域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晋陕豫区的三里桥文化、晋东南地区的陶寺文化、伊洛—郑州一带的王湾三期文化、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文化等几个不同的文化类型,而原来属于大汶口文化势力范围的豫东地区也同时形成了一支面貌上更接近中原地区的地方类型—造律台文化。如果说龙山时代早期在中原地区的东部甚至伊洛—郑州一带还能见到来自东方海岱文化区和南方长江中游文化区的文化因素的话,到了龙山时代的晚期阶段中原龙山文化,特别是王湾三期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向外扩张势头,以侧装三角形足鼎、直领广肩罐、浅盘细把豆、浅腹圈足豆、小口瓮、盆形擂钵等为代表的王湾三期的文化因素大批南下江汉平原,可能是导致该地区强大的石家河文化衰亡的主要原因。在尧舜禹征伐三苗的历史背景下,中原文化区不仅在同南方苗蛮集团的折冲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而且军事实力的增强和政治体系的走向成熟也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厘清中原地区史前聚落演变和文明起源的脉络,本文将以中原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时间顺序为线索,对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前期前段、仰韶文化前期后段、仰韶文化后期前段、仰韶文化后期后段和龙山时代六个时段中原地区不同区域聚落的结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进行初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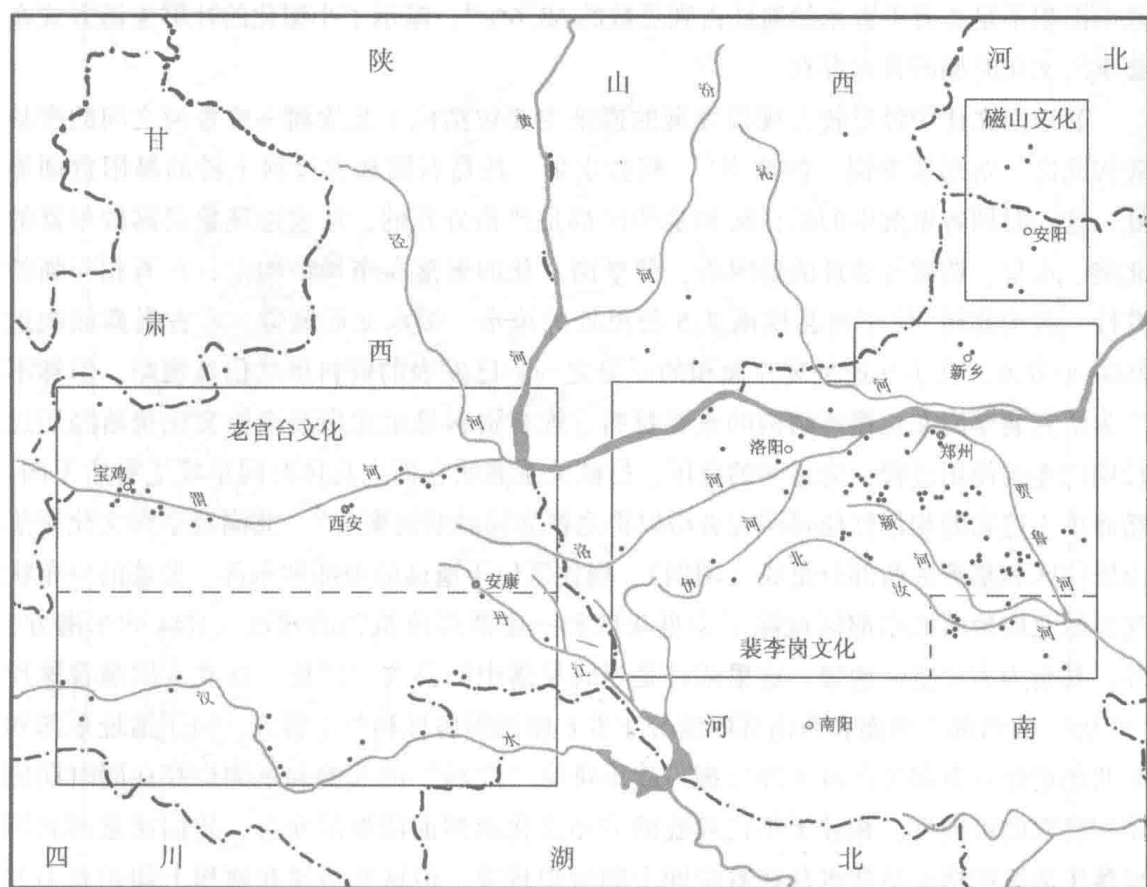
二 中原地区史前聚落的演变

按照威利的理解,聚落就是“人类将他们自己在他们所居住的地面上处理起来的

方式。它包括房屋、包括房屋的安排方式，并且包括其他与社团生活有关的建筑物的性质与处理方式”^⑫。同以器物分析为重要基础建立起来的器物谱系学及考古学文化研究不同，考古学上的聚落研究更加重视的是各种考古遗迹间的时空关系。同时期的聚落研究应该包含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前者指的是单个聚落内部各种遗迹之间的关系和聚落内部结构研究，而后者则是聚落分布及聚落间相互关系的考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研究的参照物与时空尺度的不同，聚落形态的演变同考古学文化的发展阶段不一定是同步的，因此我们在考古工作中既能看到同一考古学文化发展阶段上，存在于某个遗址的聚落经历了几次变迁，也可以观察到考古学文化已经变化而原有聚落仍然被使用的情况。

（一）新石器时代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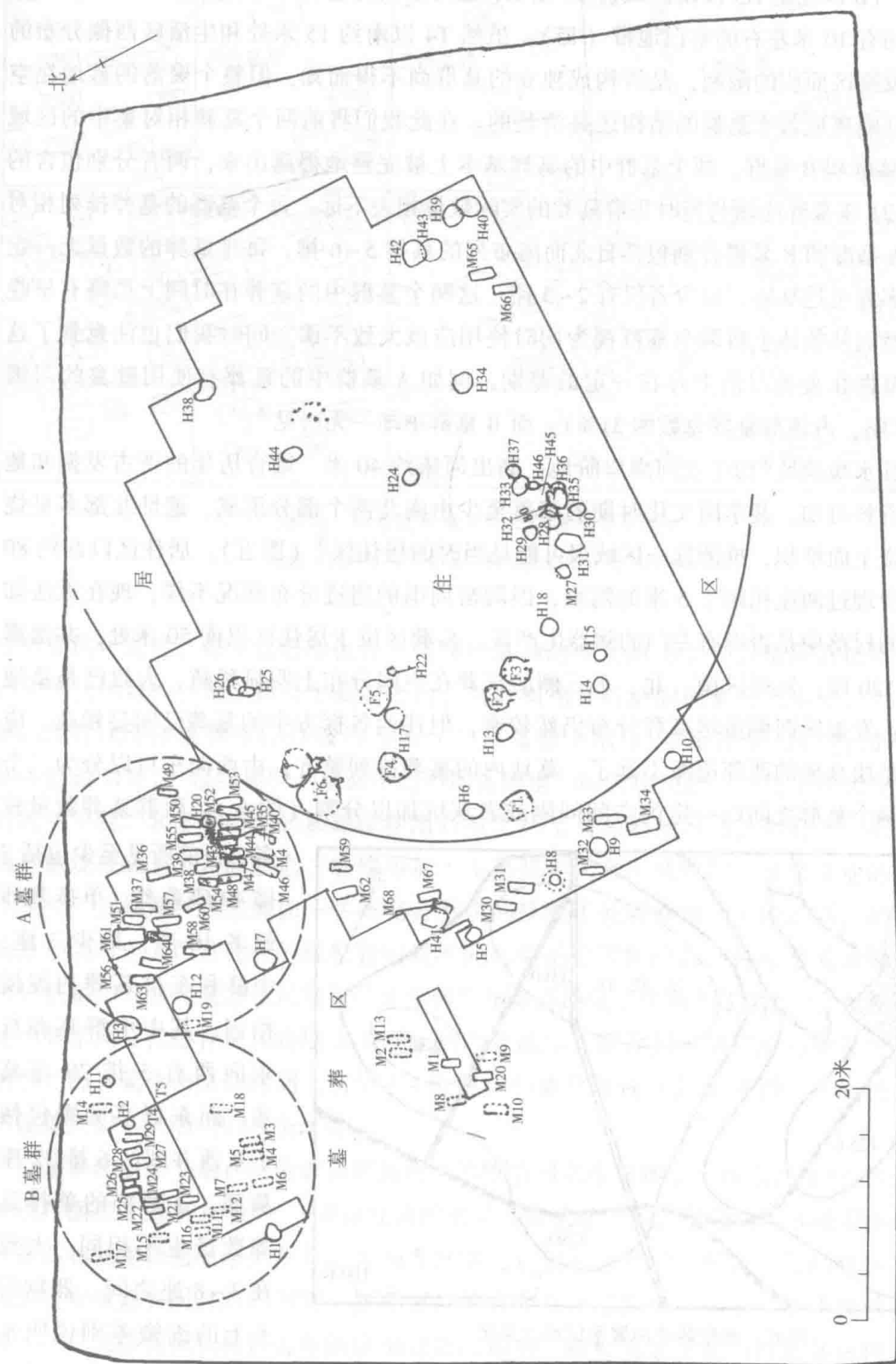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中原地区分布着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这样三支不同的文化类型，其分布区域各以伊洛—郑州、豫北冀南和关中的渭河流域为中心。目前这三支考古学文化的遗址在发现数量上有着相当的差异（图三）。数量最多的裴李



图三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聚落分布示意图

岗文化已调查发现遗址 70 余处，其中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也达到十余处之多。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豫西山地的东缘和黄淮大平原的过渡地带，空间分布上有着明显的地区不平衡性。嵩山以南、许昌以北，特别是北汝河与贾鲁河之间区域的遗址分布最为密集，而嵩山以北—黄河沿岸、北汝河下游地区在遗址数量上则要零星得多。根据各遗址间空间距离的疏密关系，这些裴李岗文化遗址显然可以被划分成若干个规模不大的聚落群，并且这些聚落群之间的文化联系显然是有所区别的，嵩山以南的北汝河和贾鲁河之间区域的聚落群在文化面貌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它们构成了裴李岗文化裴李岗类型的主体。分布在北汝河下游的裴李岗文化遗存的面貌同裴李岗类型有所区别，学界一般认为其构成了裴李岗文化的另一地方类型—贾湖类型，这里同样是数个空间位置相近的遗址构成小规模聚落群，例如舞阳贾湖遗址周围半径 10 公里的范围内就共存着 5 个同时期的聚落^⑬。在嵩山以北的洛阳—巩义附近，裴李岗文化也具有区域性的特点，这里的聚落群同嵩山以南地区聚落群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总体上看，裴李岗文化的聚落面积都较为有限。赵春青曾经统计了郑洛地区 35 处单纯的裴李岗文化遗址的面积，发现它们一般都在数千到五万平方米之间变动，其中面积不足 2 万平方米的遗址占到总数的 68.6%^⑭，暗示了小型化的社群生活方式在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普遍存在。

裴李岗文化中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遗址主要包括位于北汝河—贾鲁河之间的密县莪沟北岗、新郑裴李岗、沙窝李^⑮、郑县水泉、长葛石固和北汝河下游的舞阳贾湖等处。这一时期各聚落中的居住区和墓葬区都是严格分开的，从遗迹现象揭露较丰富的北岗、水泉、贾湖等遗址的情况看，裴李岗文化的聚落在布局结构上存在着相当强的共性。莪沟北岗^⑯位于密县城南 7.5 公里处的洧水、颍水交汇地带。考古揭露面积近 2800 平方米，几乎达遗址现存面积的三分之一，已发表的资料虽然仍显粗略，但却不失为研究裴李岗文化聚落结构的重要材料。现有资料显示北岗裴李岗文化聚落经历过长期的连续使用过程，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表明它们在具体时间早晚有所不同，然而出土遗物的相似性使得研究者得以将之视为同时期的聚落^⑰。北岗裴李岗文化聚落由居住区和墓葬区两部分组成（图四）：居住区位于遗址的中部和东部，遗迹的分布状况显示北岗聚落的东部区域除了少量灰坑和一座圆形建筑物的残迹（H44 的东南方）外，其余为大片空旷地带，这里或许是当时聚落中的公共“广场”所在。围绕着这片“广场”的西部、西南和东南部断续分布着 6 座圆形房址和若干窖穴。由于遗址东部和东北部边缘尚有部分区域未经发掘，故不排除“广场”的北侧和东侧也存在同时期房屋和窖穴的可能性。相较于年代较晚的仰韶文化前期前段聚落而言，我们注意到北岗聚落生活区的房屋虽然也存在着空间上的分组现象，但这些房屋在面积上却相差不大且门道基本都不是朝向“广场”方向的；墓葬区位于遗址的西北和西部，墓葬的空间分



图四 莪沟北岗聚落平面图
(据《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图二改绘)